



华南师范大学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EWS
LETTER 第十二期

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全岛 全产业 中央统筹 部门支持 省抓落实



《跨境教育通讯》

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基地)



跨境教育 质量为本

当今世界，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进行。“抢占国际化办学高地”正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学生流动、人才流动、学术流动、办学流动等为载体的跨境教育备受国际教育领域各方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哈佛大学要求所有学生都有“国际经验”；耶鲁大学制定了全盘国际化战略规划；欧盟通过“博洛尼亚进程”推进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动跨国界教育体制改革。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跨境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截至目前，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各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近2300个，其中本科以上学历机构和项目近1200个；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生达到66.21万，2019年超过70万；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地国和世界最大跨境教育资源国家。

质量是跨境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根本。在中国跨境教育规模日益扩大的今天，质量保障尤为重要。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加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同时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质增效，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是新阶段跨境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跨境教育质量的提升，助力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事业的发展，2018年7月，华南师范大学成立“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2019年1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我校达成协议，依“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设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中心秉持“创新开放、合作共赢、追求卓越”的发展理念，从事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其它形式跨境办学质量保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努力打造成为我国跨境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和质量保障研究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之一。

《跨境教育通讯》(Newsletter)是我中心分享国内外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前沿思想动态与实践经验的形式之一。本刊暂设教育政策、观点纵横、经验分享、国内视野、海外视野等五个栏目。提供国内跨境教育领域的重大影响事件和重点新闻资讯；传递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跨境办学的最新政策导向；聚焦国内外在跨境教育质量保障领域的经验做法；报道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最新的情况；转载国内外有关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名家评论、论文著作、会议讲稿、活动信息和数据解读等。

我们衷心希望，每一期发布的《跨境教育通讯》能够为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从事跨境教育工作的其他机构提供信息参考，成为关心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事业的有识之士的日常读物。

华南师范大学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吴剑丽



目录 CONTENTS

【教育部门】

- 教育部、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 01
-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海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答记者问 ----- 02

【经验分享】

- 多元国际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的融合与创新——以华南师范大学佛山校区为例 ----- 03
- 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办学新道路——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 ----- 10

【观点纵横】

- 刘利民：提高跨境教育质量保障能力 助力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 13
-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疫后重启”应关注“一个抓手”“一个信号” ----- 17
- 蒋文嘉 杨晨：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影响研究 ----- 19
- 郑淳：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 26

【国内外视野】

- 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粤港澳大湾区)在广州召开 ----- 30
- 中工网报道：留学生求职首选回国发展理工类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向好 ----- 32
- 协同治理：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 35
- 英国将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上升为国家战略 ----- 44

【中心动态】

- 关于邀请参加第24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平行论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研讨会的通知 ----- 47

教育部、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为主动灵活的教育对外开放，支持促进和规范管理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2023年3月24日，教育部联合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制定了《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系统设计了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的基本规则。

《规定》着力推动办学模式创新。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是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规定》明确，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理工农医类学校或者校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设立的办学机构在学校治理、学术管理、师资配备、收费制度等多方面都实行更加自主、灵活的政策。

《规定》着力推进依法依规办学。通过制度设计推进在法治轨道上办学。《规定》强调办学应当遵守中国法律，符合公益性原则，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办学机构作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法人，要接受中国法律的监管。《规定》要求办学机构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要求开设包括中国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规定》明确办学机构开展党群活动按照国家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党群活动的有关规定执行。

《规定》着力强化办学质量保障。推动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办学，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准入方面，规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的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具有良好的办学声誉和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具有理工农医类方面的学科优势、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和良好的业内评价。在培养方面，规定境外高等教育机构按照不低于本机构的教师配备标准选派或者招聘足够数量的教师到办学机构任教，鼓励办学机构引进国内急需、在国际上具有先进性的课程和教材，鼓励办学机构和境外高等教育机构互派学生、互认学分。在监管方面，规定办学机构应当建立办学质量保障制度，向社会公开其办学情况，向主管机关提交年度办学报告，接受主管机关依法组织的办学质量评估，保障办学质量。



来源：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304/t20230423_1056838.html

责任编辑：黄欣雨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海南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就《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答记者问

1.问：请简单介绍一下制定《规定》的依据和主要考虑？

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2021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施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定，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可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理工农医类学校。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为主动灵活的教育对外开放，支持促进和规范管理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教育部联合海南省人民政府对标对表中央决策部署和法律规定，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结合改革实践需要，研究制定了《规定》，以教育部、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

2.问：如何理解《规定》的适用范围？

答：《规定》适用于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教育的学校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区（以下称办学机构）的办学活动，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从举办主体看，办学机构的举办者限于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独立设置的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从机构形式看，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办学学科类别看，限于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四个学科中一个或多个学科。

3.问：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需要遵循什么方针？

答：《规定》明确，对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实行扩大开放、质量优先、依法管理、鼓励发展的方针。第一，扩大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是促进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要扩大开放力度，拓展开放领域，丰富开放形式，以高水平开放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第二，质量优先。要把好入口质量关，引进的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具有良好的办学声誉和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具有理工农医类方面的学科优势、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和良好的业内评价。要把好教育教学质量关，明确对办学投入、师资配备、教材选用等方面的要求，加强质量评估，推动提高办学质量。第三，依法管理。要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及教育法律法规，对办学行为进行依法管理，依法保障办学机构的自主权。办学机构也要遵守中国法律，符合公益性原则，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第四，鼓励发展。要制定和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推动办学机构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办学总体统筹规划，按照“成熟一个引进一个、引进一个办好一个”的原则推进办学活动，避免一哄而上、无序发展。

4.问：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和以往的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区别？

答：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是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之外的新探索。与既有的中外合作办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举办主体。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不需要中方教育机构共同参与举办，但中国境内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提供土地、校舍、资金等资源参与办学。二是办学层次。办学机构限于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确有必要可实施专科教育。三是学校治理。在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招生、教学、学术治理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

5.问：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能够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答：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所设立办学机构的合法权益，受到中国法律保护。办学机构除了享受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规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外，还可以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的优惠政策。一是学校进口自用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享受“零关税”政策，与学校一起来海南的合作企业，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端人才15%的个人所得税上限。二是外籍人士居留更加便利，海南逐步实施更大范围适用免签入境政策（目前实行59国免签入境），逐步延长免签停留时间，对外籍人员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外籍教师及工作人员在海南工作、居留、生活更加便利。三是海南按照现有政策，对引进的国内外知名高校在科学研究、机构设置、人才引进及其子女配偶落户、子女入学、医疗保障、购房购车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还将根据法律授权，结合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优惠政策。海南真诚地欢迎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到海南办学，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新机遇。

来源：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304/t20230423_1056839.html

责任编辑：王燕苹 黄欣丽

「经验分享」

多元国际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的融合与创新 ——以华南师范大学佛山校区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呈迅猛趋势发展，这为国内各类教育机构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组织联合教育项目以及促进高校国际化的多形态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跨境教育作为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各级各类机构大规模开展。同时，国家和地方更加注重对本领域办学层次和质量的规范和把控，进一步完善对此类教育模式的评估体系，推进对其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

广东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积极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现实需要和未来目标，重点支持世界科技前沿、数字教育、新兴交叉学科和薄弱、空白、紧缺的学科专业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合作办学建立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具有竞争力的、产教深度融合的一流学科群，不断优化合作办学学科专业和层次的整体布局，支持各类院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更高层次开展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建设。在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上，坚持高端引领、分类指导，坚持特色办学、高质量办学，坚持规范、有序发展的基本原则，推动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在高端引领方面，支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大学发展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大学，促进非独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向国际先进水平发展，推动境内外高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发展专业举办的合作办学项目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在政策指导方面，加强政策研究和顶层设计，修订《广东省合作办学工作指引(暂行)》。在高质量办学方面，实施“高质量合作办学示范建设工程”，形成层次类型更加优化、学科专业分布更加合理、合作模式更加丰富、特色更加明显的中外合作办学，推动广东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华南师范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广东省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及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将国际化战略置于学校办学的重要地位。学校紧密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全面规划学校对外开放布局，全力推动学校国际化进程。学校以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国际化办学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把佛山校区打造成国际合作的示范区、新工科及交叉学科的增长区、产学研合作的试验区、服务地方的先行区和体制机制改革的特区。在国际化办学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

佛山校区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自2002年开始，学校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启动2+2中外合作教育项目；2007年，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等国外大学开展了2+2联合培养项目；2013年，学校在佛山校区设立国际商学院，为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新平台；2014年，与英国阿伯丁大学合作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成功获批，并在2018年顺利通过了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2018年，校区先后成立国际联合学院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中心)，发挥国际化办学引导和统筹作用。2019年和2020年，分别开展中英、中澳、中美和中法的本科和硕士层次中外联合培养，并启动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申报工作。2021年，获批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目前已形成多元国际化合作办学体系。



图1.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校区国际化办学历史

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办学的高质量发展，学校于2018年成立了华南师范大学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并于2019年3月挂牌成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基地)将为跨境教育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搭建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承担全国范围内跨境教育机构和项目的治理、监测、评估与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共同推进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工作。

一、国际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的借鉴与融合

(一) 中澳项目质量保障

华南师范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大学)于2003年至2011年在佛山校区(原南海校区)开展中澳合作项目。该合作项目根据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ustralia Quality Framework)的要求在2007年进行项目评估，这是华南师大参与的首个跨境教育项目质量保障评估。在质量标准上，项目依照RMIT大学本土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标准，在教学环境、教学模式、师资水平、课程设计和教学质量等方面保持与RMIT大学本土项目同等水平。在评估范围上，涉及合作协议、RMIT政策的适用与实施、项目管理、监控流程、学术和学生服务支持、项目管理和交付、财务可行性、学生反馈和质量保障，以及AQF(2007年)实施符合程度。在评估流程上，按照数据收集、实地调研、调查报告、报告审核、结果反馈五个阶段进行，项目评估历时约6个月。最终由RMIT大学发布一份项目评估报告，并通过风险评估机制将项目的问题和改进措施建立四级风险(极高、高、中和低)管理台账和督办问责机制，以及改进实施计划。在质量保障的成果上，RMIT项目评估报告从学生满意度、入学人数的持续增加、项目知名度的持续提升、学生晋级率、良好的社会效应等方面积极评价了项目合作取得的成果，从项目合同管理、AQF政策和程序的执行、教学管理与项目交付、语言中心课程、学生管理、学生支持与服务、中方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等方面提出问题及改进意见。该评估提升了项目教学质量，为我校国际化办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质量保障实践经验。



2007年通过RMIT大学项目评估

(二) 中英项目质量保障

华南师大与阿伯丁大学合作开设的金融学专业于2014年获批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过8年的发展，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办学成效日渐显现，培养的高质量毕业生倍受学校和社会的关注，成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的标杆项目。该项目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广东省质量工程特色专业建设、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等为抓手，开展质量保障建设工作。在具体实施方面，华南师大整合了中外双方教学管理资源，组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自评委员会”，并下设5个自评工作小组，分别从办学定位和目的、资源配置和使用、教学活动和教学服务、组织管理和内部质量保障、公共关系与社会诚信等五个维度展开质量保障的评估工作。在质量保障的标准和流程上，自评工作小组对照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的5条标准和12个一级指标和相关二级指标，依据观测点对中英合作项目进行自评和检查，最终形成自评报告，通过以评促改，不断总结经验和排查问题。在质量保障的成果上，2021年华南师范大学的中英项目通过了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该认证对项目基本情况、办学模式、培养目标、招生管理、办学及管理团队、项目特色与优势、办学规范性、党建工作及学生日常管理、深化专业综合改革的主要举措和成效、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跟踪调查结果和外部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和客观的总结，确保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2021年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

（三）国际商学院国际化评估

国际商学院是华南师大佛山校区国际化办学基础上成立的学院，是学校重要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和窗口角色。学院自成立以来，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高校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中外联合培养、学生交换等一系列多元国际化办学项目。学院高度重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于2016至2018年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估、测量和研究专家——西密西根大学Gary Miron教授合作开展了一次全面的学院国际化办学评估。在质量评估标准上，采用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的国际化综合评价体系为理论基础。在质量评估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学院国际化办学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围绕学校与学院国际化发展愿景、国际管理体系、国际化课程建设、学生流动性、教师国际发展和流动性、国际学术研究合作及伙伴关系等六个方面展开评估。在质量保障成果上，建立了国际商学院国际化综合评价体系框架，梳理了国际商学院在人才培养、管理构架、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的经验做法，为学院发展战略设定预期的发展目标，为学校国际合作办学扩容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通过美国西密西根大学Gary Miron教授国际化办学评估

二、中外融合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阿伯丁学院是华南师大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合作共建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于2021年获批成立并启动招生，办学规模为1200人，开设3个四年制本科专业，分别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华南师大和阿伯丁大学高度重视阿伯丁学院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构建一套中外融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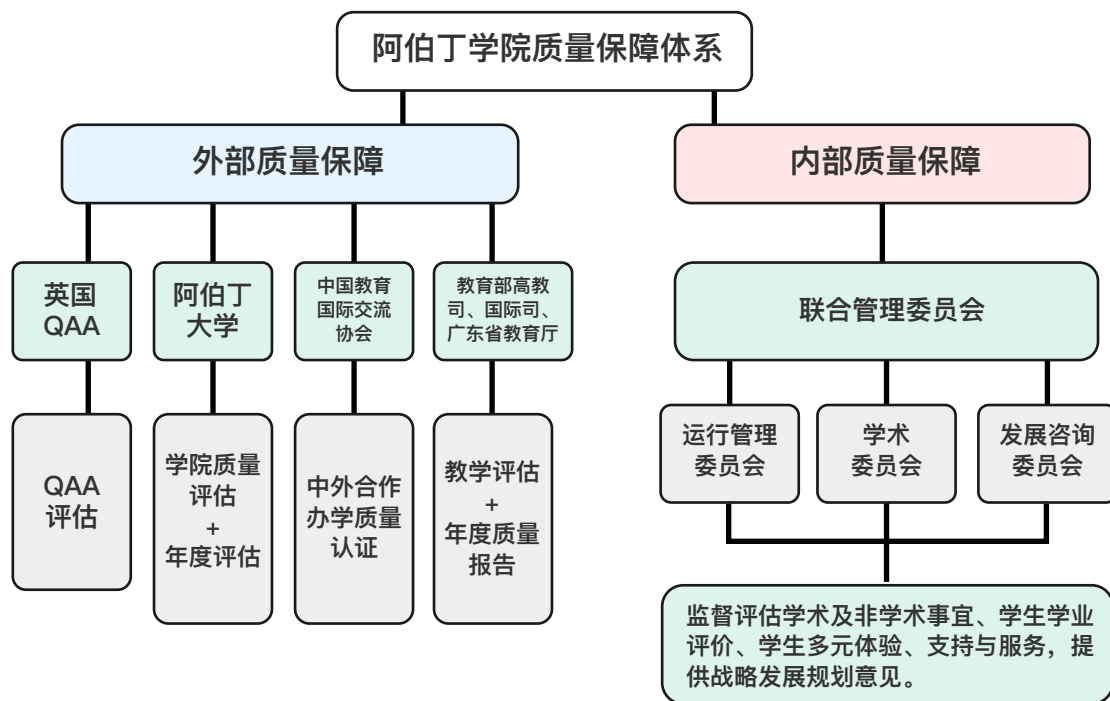


图2. 中外融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由中外方政府官方层面的质量监管、阿伯丁大学质量监控以及第三方机构质量评估组成。政府层面的质量监管主要是英国QAA机构的质量监督，以及中国教育部国际司、广东省教育厅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定期评估。英国阿伯丁大学通过学院质量评估(Institutional Quality Review)和年度评估来实现对阿伯丁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监督与把控。其质量监控主要聚焦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层面，具体包括办学形式、学术标准、规章制度、行政与实验室等基础设施、管理架构、师资队伍、专业设置、学习环境、学生服务与支持、学生学业与技能表现、教师发展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学院积极规划参与第三方组织的质量评估与认证，其中包括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学院构建了以联合管理委员会为统筹，学术委员会、运行管理委员会、发展咨询委员会并行，融合中英组织体系和规章制度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联合管理委员会作为学院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学院的领导管理与战略决策，定期对学院可能面临的风险开展评估，确保学院平稳运作；学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并落实阿伯丁学院质量保障体系，监管阿伯丁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落实和教学过程，评估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表现；运行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联合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履行行政职能，监管学生非学术的体验及过程；发展咨询委员会为学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咨询与规划意见。学院的质量保障规章制度由英方副校长牵头统筹各专业教学团队完成，形成阿伯丁学院学生手册、教师手册，出台学生转专业、休学与复学、学生考勤、教师调停课等一系列涵盖评定标准、学术要求、教学管理、学生日常管理等各个方面内容的质量保障文件。另外，重视学生权益的保障，在相关委员会中设立学生委员代表，使学生实质性地参与学院各项评估，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內部质量保障。

结语

华南师大佛山校区经过多年的国际化办学经验积累，实现国际化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一方面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为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打造了多专业、多模式、多层次的多元国际化办学格局及其质量保障体系，为合作办学的融合创新做出有益的尝试。

一是通过质量保障建设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合作办学中，佛山校区以立德树人、学生为本、能力导向的教育理念为根本，以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化师资队伍、创新型教学模式、联合管理机制、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为改革路径，打造全英教学、实践教学、跨文化学习交流、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的中外协同育人模式，培养和造就具备全球胜任力的新商科、新工科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二是通过质量保障建设强化国际化课程体系创新。在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上，将本土课程、引进课程、共建课程与专业课程、通识课程、语言课程充分交叉融通，形成学生专业知识、实践能力与国际化素养等三大知识与能力的统一。

三是通过质量保障建设打造中外教学资源共享模式。在各类国际、校际合作课程的建设过程中，中外方教师充分融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持续创新，实现中外教学资源和教学成果的共建共享。

四是通过质量保障建设推动研究与实践相融相促。佛山校区结合多年合作办学实践经验，依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平台，开展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不断推进学校国际化发展的同时，形成具有借鉴作用和辐射效应的国际化办学的理论成果。基地充分融汇各类平台资源，开展项目研究，为政府决策和高校办学提质增效提供智力支持。

中外合作教育的质量保障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工作，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作为办学的实践者，应不断探索与国外质量保障体系的融合与创新，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逐步形成既体现本土特色又获得国际认可的本土国际化的质量保障体系。

作者：

吴剑丽，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主任

庄慧娟，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副主任

陈欢，华南师范大学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黄欣丽

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办学新道路——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在办学理念、学术机制、人事制度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创新实践，通过“在地国际化”与“跨国交流合作”双轨并行，集聚了大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拓展了前沿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对国家和区域发展产生了强大的人才和科研支撑力量，一条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道路初现雏形。

一、创新办学理念：党委领导下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地处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抓住时代机遇，四方共建广州国际校区，全面探索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办学新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场生动实践。

相较于以“师生跨境流动”为主要标志的传统国际化，在地国际化具有“立足本土本校”“面向全体学生”“有效提升全体学生国际化和跨文化素养”等特征。如何有效实施？首先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这是广州国际校区谋划之初摆在华南理工大学面前的崭新课题。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广州国际校区采用“中方为主、国际协同”新机制。“中方为主”，关注办学方向，坚持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国际协同”，采取“一对一”“一对多”的新模式，每个学院都与一所或若干所世界一流高校开展合作，引入全球高端人才和优质教育资源。

在这样的办学思路指导下，学校首先通过大学章程给广州国际校区充分“赋权”，包括且不限于政策独立制定、人员独立配备、财务独立核算、资产独立管理、内设机构独立设置、学科专业独立布局、教学科研独立开展、招生制度独立制定等。

在组织架构上，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由党政机构、服务支撑系统、学术系统以及书院系统组成，其中党政机构下设校区管委会和校区党委，坚持党的领导。

广州国际校区实行国际通行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由教育部、广州市、知名企业、国际合作学校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共同组成理事会，负责确定校区办学方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方向与领域、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及其他重大事项。理事会下设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咨询顾问委员会等若干专业委员会，负责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与科学研究等事项。例如，前沿软物质学院第一届国际学术委员会由8名中、美、日、欧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院士组成，助推学院在软物质研究领域达到并保持世界一流研究水平。

二、创新学术机制：搭建产教融合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

广州国际校区每个学院都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应学院和学科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合作。其课堂采用小班化、全英授课的探究式教学，课外教育采取“书院制+全员导师制”，打造新工科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面向国际前沿基础研究和国家区域战略需求，广州国际校区重点布局新兴交叉学科或学科新方向，紧紧围绕高端制造、生命科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等领域建设新工科学院，同时以“学院+若干研究院”模式构筑交叉学科群。目前，挂牌成立了吴贤铭智能工程学院、前沿软物质学院、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及教育部首批批准设立的未来技术学院。校区还投入21亿元以建立7个世界领先的学科平台和研发中心。

三、创新人事制度：对标世界一流兼具中国特色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预聘长聘终身教职制为主，中国特色事业编制为辅的人事机制体制，推动全链条人事制度改革。在新进教师的招聘准入、培养、岗位晋升方面，逐步形成并优化较为成熟完备的遴选、聘任程序。

对于第一资源的人才，要能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广州国际校区遵循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对各系列职位结构与能力要求的共识，对学术职位进行科学规划，完成系统化的顶层制度设计。此外，根据所承担国际化教育教学和交叉科学研究特点，允许“一院一策”“一院多策”，针对不同系列、不同学科特点的教师职位制定了差异化的聘用方式、聘用条件、评价标准和保障体系，实现人才队伍增长方式由规模到质量、岗位聘用管理由身份到岗位的改变。

广州国际校区深度参与了学校沿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城市布局的“五院一园一室”协同创新体系，围绕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前部署基础研究，强化有组织科研，持续推进产学研融合，实现研究聚焦的久久为功，形成研究关键进程的持续发力；建强“学院+高端研究院+行业联盟”的产教融合方式，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创新与技术体系相适应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实现科技成果由体制内循环向“内外双循环”的转变。

目前，校区已与广州市人民政府、博世互联工业三方共建工业4.0创新技术中心；已建成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塞门扎领衔的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和肿瘤微环境研究所、美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的前沿软物质学院和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领衔的自旋科技研究院等产学研融合平台。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广州国际校区已成为高端人才磁石，大批学术大师和科研团队集聚在这里。截至目前，校区已引进两院院士、海外发达国家院士和学术大师在内的高层次人才150余人。新聘师资队伍100%具有海内外一流高校、科研院所经历，其中直接从海外引进人员占92%，高层次人才超过60%。

“生逢伟大的时代是人生之幸。”来到广州国际校区，殷盼超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他在国内率先开辟《散射方法概论》课程，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输送紧缺的人才，同时形成了系统性的新材料设计理念，指导相关材料的设计和加工。

殷盼超所在的团队是学校软物质先进功能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是校区整建制、团队式引才，打造国际化高水平师资队伍的一个缩影。这支团队由美国工程院院士领衔，已汇聚了一支年轻化、国际化、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力量。团队与多家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发光学补偿膜材料等应用研究，打破国外垄断，形成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

四、“双轨并行”：在地国际化+跨国交流合作

华南理工大学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教育资源及要素，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模式，实施“在地国际化”与“跨国交流合作”双轨并行国际化办学新路径，加快推进“双一流”和广州国际校区建设。

学校党委书记章熙春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学校要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教育之路。广州国际校区实施在地国际化办学，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教育，而是鼓励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协同与创新，既要学习借鉴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将其转化为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着力点和生长点。

优质教育资源的互融互通，是在地国际化培养的一大助力。华南理工大学与美国罗格斯大学、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互设海外教育(交流)基地，与罗格斯大学创设性共建海外名校合授课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落地共享，惠及广州国际校区2021级全体学生。邀请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顶尖高校教授开设20余个寒暑期线上课程，不断扩大学生全球视野。

罗格斯大学是华南理工大学全面合作伙伴，过去的15年里，双方共建中美创新学院，已有300余名华南理工学生完成了两校双学位项目，两校教师互动频繁，合作成果颇丰。疫情爆发后，两校启动ROSE借读项目，接收4批罗格斯大学中国籍大一新生来校学习。该项目实现了中外教学和管理团队的深度融合，以及双方教学体系和课程的互融共建，教学效果显著，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在地国际化办学的成功实践之一。

广州国际校区高度重视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学、先进材料等新兴交叉专业搭建国际联合培养项目，大力派出优秀学生，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目前，校区与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的多所名校签署学位项目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国际成长环境和接触跨文化与国际性事务的机会。据统计，广州国际校区学生目前可参与的优质海外交流项目达130多个。2021年，校区开始派出学生赴境外参加学位项目学习，2022年派出人数大幅增长。

2020年1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华南理工大学调研，要求学校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新工科建设，在“书院制”和“全员导师制”方面加强探索，实现内涵式发展，勇当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排头兵，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和国家发展的能力。

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官网

<http://www2.scut.edu.cn/gzic/2023/0227/c30281a492428/page.htm>

责任编辑：王燕苹

「观点纵横」

刘利民：提高跨境教育质量保障能力 助力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并把它作为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要求“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强国既要通过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满足公众对公平与卓越的教育需求，确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能够支撑甚至引领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各种比较优势和话语权，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教育强国是世界教育里的强国，嵌入全球坐标定位，体现国际交流、合作、引领和竞争的能力。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程度的重要维度。因此，加快、扩大和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就教育强国建设作了重要讲话，成为指导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教育对外开放进行专段阐述，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不仅高度肯定了教育对外开放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其在教育强国内涵中的价值和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始终秉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基本方针，对外开放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要素、鲜明特征和重要支撑，成为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进入新时代，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的要求，以“一带一路”为龙头的开放布局不断拓展，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搭建合作平台，“留学中国”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境外办学稳步推进，更全方位、更多层次、更宽领域、更加主动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中国教育越来越吸引全世界的关注，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面向2035，教育对外开放要对照总书记对教育对外开放的目标要求和殷切期望，对标教育强国在国际范畴的指数和表征，坚持提质增效，逐步完善治理，提升教育对外开放布局的拓展性和稳定性，增强对世界杰出学生学者的吸引力，提高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扩大全球教育议题规则标准设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高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对外阐释与互鉴能力，通过构建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体系，将高水平开放发展理念融入教育现代化进程，统筹外部优质资源助力教育公平、教育水平、教育服务能力、教育创新能力、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建设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教育强国。

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支撑，教育国际交流领域各相关方，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学校以及社会力量等应当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有效协同、形成合力、共谋发展。作为代表中国教育界开展民间对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全国性组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构建对外开放发展共同体，为中外教育架起交流合作的桥梁，不断拓展民间教育国际网络、打造教育交流互鉴平台。面对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交流协会应时而动、顺势而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围绕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的基本方针，在各类教育交流项目不断拓展渠道、丰富形式、深化内涵、打造品牌的同时，聚焦跨境教育这一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领域，按照管办评分离这一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作为交流协会服务教育对外开放乃至整个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同时作为自身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培育核心业务领域和核心专业力量，积极参与构建国家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从而全面提高中国国际教育质量水平，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跨境教育是教育对外开放中最深度融入中国教育体系的领域。其中，来华留学教育直接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的吸引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国际传播能力和中国软实力；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向世界开放我国教育市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我国引进和吸收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助力推动我国教育水平、创新能力及治理能力的提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引进来”的规模和质量。可见，有效保证和不断提升跨境教育特别是来华留学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水平，是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教育强国建设紧密关联。进入2010年代以来，交流协会在教育部国际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在中外合作办学、来华留学教育以及高中国际项目等领域开展以认证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和各种质量保障服务项目，为跨境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全力推进教育服务认证机构建设，打造客观公正、专业权威、政府采信、社会认可、国际特色的认证品牌。作为教育系统直属单位中唯一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教育服务认证资质的专业认证机构，交流协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教育部等八部委《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为指导，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在教育评价中的功能作用，汇集和培育专家力量，加强专业能力建设，按照国家关于认证工作的相关要求，遵循跨境教育领域的专业规律和特点，依据国家跨境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规范，结合一线工作实践，借鉴当前世界主要教育中心的教育评价先进理念和模式，研发和制定跨境教育质量认证标准和规则制度体系，探索和实践“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去年，跨境教育质量认证项目体系正式纳入了教育部督导局公布的高等学校评估项目清单，评价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进一步得到认可。

目前，交流协会开展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认证项目已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的250多所高校，全国接收和培养来华留学生高校中的四分之一强加入了这一质量共同体，其中近百所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龙头高校，为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走出去”保驾护航，为打造“留学中国”品牌构建高品质国际教育大学矩阵，为扩大我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作出特殊的贡献。此外，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交流协会正在配合教育部国际司研发质量认证项目，旨在为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建立引领高水平、示范性发展的行业标准，确保“有效引进和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在高职高专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交流协会自主实施兼有合格性和水平性评价特点的认证项目，将高职高专层次也纳入质量保障体系，从而整体抬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

二是聚力开展跨境教育质量保障项目，为政府和学校提供专业服务和支撑。首先，充分利用认证形成的专业评价能力，建立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的评价项目体系。例如，承接山东、河南等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其属地内开展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实施质量评估，为其履行好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提供专业支撑；同时，也面向高校个体，为其跨境教育质量提供监测服务，引导规范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其次，有效整合教育对外开放战线专业力量和资源，积极开展标准研发和制定，以标准化工作规范和引领行业发展。近年来，研制了《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认定标准(试行)》《海外中国学校建设标准及认定认证程序》等涉外办学标准。此外，交流协会依托国家标准委员会批准的团体标准试点单位的资质，发布和立项《卓越高中国际项目评价规范》《基础教育阶段外籍教师聘用及管理规范》《高中国际项目海外升学辅导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等多个团体标准。第三，统筹国外优质资源，打造国际化能力提升中心，为跨境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的保障服务。持续开展院校国际发展能力提升、高校中青年干部国际化能力素养提升等系列项目；组织实施中德双元制精英师资提升项目、中澳国际化双语双师建设项目、全国中学俄语教师培训项目、初中英语学科领军教师高级研修项目、贫困地区英语教师能力提升项目，推出大中学师生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跨文化领导力、全球胜任力系列项目等。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沉淀，交流协会已经初步建成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中心和国际化能力提升中心，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系统性的项目体系，培育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和鲜明国际特色的质量保障专业能力。

当前，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业已绘制。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必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跨境教育为抓手，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助推和更有效的支撑。交流协会将坚持“扎根中国、胸怀天下”，锚定“提质增效、完善治理”，致力于“中国气派、世界水平”的高质量跨境教育体系建设，为扩大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和更大的贡献！

转载：《教育国际交流》2023年第4期
作者：刘利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责任编辑：黄欣丽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疫后重启”应关注“一个抓手”“一个信号”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处于加快“疫后重启”的关键时期，有两个信息值得关注。这也是实行新冠疫情“乙类乙管”新形势下，许多会员单位、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的咨询涉及比较多的两个问题。

■ 第一，一个抓手 ■

现在离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只有2年时间了。今年4月，我在上海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强调了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过程的四个主要特点，其中一个就是“体量不大，作用不小”。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中外合作办学。应该说，正因为体量不大，社会对中外合作办学就更为关注和聚焦，她承担的任务就更为繁重。

对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她整体被赋予了引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教育舞台中央的“领头羊”“排头兵”“桥头堡”的新定位。也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不仅要“引进来”，还要充分发挥它与生俱来的优势和特色，做强做大自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带领全国高等学校“走出去”，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一个新的政策趋向，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疫后重启”的重要抓手。近期，我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了这一点。

中外合作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办学实体，与外方合作院校加强合作与交流，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个还不是全部。应该说，按照法规条文，中外合作大学除了不能再与其他境外高校合作设立办学机构之外，普通高校有的国际合作交流形式，中外合作大学都可以有，而且比普通高校更有优势和条件做好。比如，可以有来华留学、出国留学，教师交流与培训，人才引进，合作设立科研课题，共建联合实验室，等等。还可以和“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对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做好自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发挥办学主体作用的重要体现。教育行政部门将来在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标准和评估标准进行调整时，也会更加重视这一方面，并加大它的权重。

近年来，加强自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在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不同程度开展，也取得一定成效，这是主要的，应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片面认为与外方合作高校开展合作与交流就是合作与交流的全部内容的现象仍然存在；总体上，机构和项目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情况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在“疫后重启”的关键时期，如何做强做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自身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值得我们引起充分关注。

第二，一个信号

今年3月24日，教育部、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一个月后的4月23日，这个《规定》公开发布。《规定》带有部门规章兼地方性规章属性。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与地方共同发布规章，这还是第一次。

《规定》仅适用于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教育的学校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区(办学机构)的办学活动。那么，为什么说对于整个中外合作办学来说，也是一个信号呢？允许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贸区自主办学，表明了中国加快高质量教育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对外开放将更加深入、主动、灵活。尤其是，当前发布《规定》为中外合作办学加快“疫后重启”，加快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2021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施行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定，境外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可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理工农医类学校。可以这样理解，《规定》是2020年方案和2021年法律规定的实施细则，它的出台标志着许多部署和规定可以落实落细了。

有几方面的信息值得中外合作办学关注。截至目前已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仍适用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而“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则是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之外的新探索。

按照《规定》，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不需要中方教育机构共同参与举办，但中国境内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提供土地、校舍、资金等资源参与办学；办学机构限于实施理工农医类学科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确有必要时可实施专科教育；在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招生、教学、学术治理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例如，决策机构必须由境外高等教育机构代表，办学机构校长、党组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和社会公众代表等组成。中国境内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土地、校舍、资金等资源参与办学的，可以委派代表参加决策机构。校长可以由境外高等教育机构选派，也可以由决策机构组织遴选。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所设立办学机构可以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学校进口自用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享受“零关税”政策，与学校一起来海南的合作企业和高端人才，可享受充分的税收优惠。对外籍人士来海南工作也将逐步实施更大范围免签入境政策(目前实行59国免签入境)和工作许可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等。这些新探索无疑将对中外合作办学未来发展提供许多新的启迪。

转载：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https://cfcrs.xmu.edu.cn/2023/0707/c4034a475834/page.htm>

作者：林金辉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王燕苹 黄欣丽

蒋文嘉 杨晨：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影响研究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正持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演变。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地缘政治博弈升级，全球治理逐渐失衡。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而新兴国家崛起带来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寻求更多地参与国际制度与规则制定。这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挑战与机遇，也使我国对培养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

坚持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积极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中国方案，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深化与重要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主动加强与国际组织、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研究动因

为践行大学使命与责任，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升全球影响力，全球各高校纷纷提出其国际化战略。如《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以构建未来塑造力为顶层战略，提出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京大学全球开放发展战略(2020-2030)》以“变革引领”为主题，构建“智引全球”(BRAINS)的教育开放发展方案；《西安交通大学关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若干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构建全球合作网络，将国际交流合作融入学校事业发展全局；《耶鲁大学全球战略(2019-2022)》提出“培养世界公民和世界领袖”，并成为“全球研究领域的领袖”；《麻省理工学院全球战略》表示要“推进前沿研究，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

国内现有对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研究重点关注国内外大学战略规划流程与核心要素，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研究关注国际组织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及大学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模式，忽视了国际化战略及其行动方案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弥合国际化战略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间的空白，从人才培养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视角，分析大学国际化战略对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价值体现。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本质上是将全球胜任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清华大学2016年发布的《清华大学全球战略》对全球胜任力进行了系统解析，即在国际与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包括认知、人际、个人三个层面的六大核心素养。大学国际化战略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并依托大学的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与国际合作功能，实现对全球的责任与担当。

（一）以国际化战略引领人才培养方向

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构建了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在顶层设计上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奠定了基调。《麻省理工学院全球战略》提出培养创新、合作、高效、明智的未来领袖，其核心价值是坚持发现与追求智慧、寻求创新的问题解决方案、诚实正直、尊重他人及其他文化、尊重多样性。《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参与战略》指出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为国际化的生活与职业发展做好准备。《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战略：五年计划》提出要培养在任何国家和文化环境下都能独当一面的国际化人才。《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提出“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学生群体，建设全球卓越的教师队伍”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而“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南京大学全球开放发展战略(2020-2030)》则表示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通晓国际事务与规则、业务精湛、外语娴熟的新时代栋梁之才，为世界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未来青年领袖。

国内大学国际化战略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出了本土化要求，在扎根中国的基础上，培养既具备优秀业务能力与国际文化素养，又深谙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本质、理解新发展理念的人才。如清华大学将“自觉与自信”纳入全球胜任力的核心素养，指出要“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与世界观，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并通过不断自我审视来提升自我”。南京大学也将家国情怀和了解中国作为人才培养的先决条件。

（二）将前沿学术研究融入人才培养过程

大学国际化战略重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融合，面对世界热点议题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在研究中持续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提出要强化在企业、创新、转化医疗等领域的科研专项能力培养，共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有效方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强调研究必须渗透到所有学位课程中，与学生的学习过程相互影响和促进，并增加学生获得跨学科技能的机会，增加与社会问题相关的跨学科博士生数量，以及根据特定的社会问题启动发展项目。清华大学落实其全球战略，将塑造全球领先观念，共享先进知识，加强对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持续推进学校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等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

依托于学术研究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理应发挥学科与科研平台优势，依托重大科研项目与学术交流网络，集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清华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的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聚焦气候领域联合研究、学生活动、人才培养、绿色校园及公众参与，成员来自六大洲9个国家的15所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国家更新自主贡献目标文件中就列出了该联盟的相关工作。

（三）以跨学科、跨文化的社会实践作为培养重要环节

大学国际化战略不仅关注学生在跨学科、跨文化培养中能力的提升，还注重发展课程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以确保毕业生将分析、洞察能力和学术技能带入职场。学校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服务，有利于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服务意识、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等。

校企合作为学生职业发展提供平台，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社会组织工作的能力。同时，专家参与企业项目，使基于研究的知识在社会得以普及，并用来支持社会决策。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表示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和全球视野，鼓励学生通过参加有代表性的咨询活动和社区服务提升领导能力，促进个人发展。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创业社团通过提供免费的联合办公空间、加速器项目、训练营、辅导、创业平台，让志同道合的学生组建社区，将学生、研究人员和社会人士联系到一起，为商业萌芽创造生长空间。由赫尔辛基大学专家学者成立的CarbonLink公司，研发了第一个实时碳足迹计算器。清华大学鼓励学生参与海外实习，包括企业实习和国际组织实习，积极学习国际规则，了解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并打造海外实践课堂，为学生创造更多海外实践机会，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设计的“丝路新探”海外实践项目，已组织多个实践分队前往中亚、东非等地区。南京大学鼓励和支持学生在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拓展国际创新创业支持平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实践能力。

（四）全球视野推动多元培养

国际合作是大学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区域性与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大学间在人才、研究等方面的交融互鉴与共同进步，为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世界一流大学间的战略性合作，有利于开拓全球视野，理解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应对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要构建最具活力的创新网络和更美好的世界，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其实现路径包括建立区域工作小组、制定区域战略建议和行动方案，并将增进与中国高校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日本东京大学提出构建全球共同体，建立

通信互联的全球网络，以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赫尔辛基大学为建设更有韧性、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不断推进大学的研究和人才发展议程。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积极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推动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截至2021年底，清华大学已与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帝国理工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等16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签署战略科研合作协议，并启动联合种子基金项目170余项。

世界一流大学间的战略性合作，有利于开拓全球视野，理解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应对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要构建最具活力的创新网络和更美好的世界，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其实现路径包括建立区域工作小组、制定区域战略建议和行动方案，并将增进与中国高校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日本东京大学提出构建全球共同体，建立通信互联的全球网络，以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赫尔辛基大学为建设更有韧性、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不断推进大学的研究和人才发展议程。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积极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推动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截至2021年底，清华大学已与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帝国理工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等16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签署战略科研合作协议，并启动联合种子基金项目170余项。

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强调了促进师生的国际交流与建设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的重要性。哥本哈根大学强调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学习机会，包括设立53门高水平英语硕士课程、50多门国际暑期课程、多学科在线课程以及与其他顶尖大学合作的联合课程。清华大学致力于为全校学生打造高品质多层次的海外学习项目，每年组织开展多种类型的海外学习项目，包括交换学习、公派留学、海外研修、短期课程、文化交流等，并成立全球创新学院、中意设计创新基地、东南亚中心、拉美中心等海外基地，促进文化交流。清华大学与海外知名院校共合作开设54个联合培养学位项目、28个全英文讲授研究生学位项目，其中11个联合培养项目入选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目前，国内高校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模式逐渐成熟，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本硕连读联合培养项目，复旦-LSE“全球政治经济”硕士双学位项目、清华大学-日内瓦大学“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双硕士学位项目和清华-耶鲁环境双硕士学位项目等“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西交利物浦大学、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南京大学南京赫尔辛基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等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中外联合培养的模式使学生在多元文化场景中，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互信，提高国际组织人才所需的专业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等，是未来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趋势。

二、落实联合国发展议程与应对全球性问题

(一) 国际化战略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

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针对面临的饥饿、贫困、健康、卫生、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制定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是指导一段时期内全球发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大学作为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核心参与者，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国际化战略与联合国全球性规划文件的结合，对学校发展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有着重要影响，学生通过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可增加对联合国工作的理解。

国外研究型大学在学校发展与SDGs融合上起步早，在SDGs发布后即积极制定相关的大学发展战略与行动方案，这一点在欧洲顶尖高校尤为明显。研究表明，荷兰高校对实现SDGs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人才培养环节设立SDGs相关课程和学位项目，在科研创新层面则围绕SDGs建立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在社会服务方面建立广泛的合作网络以实现SDGs。以乌得勒支大学为例，其在国际化战略中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培养学生和进行科学研究为自身使命。乌得勒支大学开设全球可持续发展本科学位项目，通过跨学科培养的方式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能力，同时，在硕士阶段设立与SDGs相关的专业，分别为可持续发展商业与创新、可持续性发展、能源科学、创新科学及水科学与管理[15]，结合可持续发展相关科研项目综合培养人才，其培养的学生往往更容易接触到与SDGs相关的经历及工作机会。北欧国家的大学对落实SDGs也非常积极，如挪威奥斯陆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将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置于大学发展战略的核心，将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纳入所有教育课程，以确保大学培养出有责任感的学者，指导其对未来人才的培养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并结合优势学科研究成果，实现碳中和等目标。亚洲国家中，日本对SDGs的响应较为积极。在东京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中，SDGs占据了重要篇幅，以SDGs为框架探索实现大学传播知识、建立和谐社会的使命。围绕实现SDGs，东京大学于2017年推出未来社会倡议，于2020年8月建立全球公共领域中心，旨在提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转型。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目标逐渐进入国内高校的视野。清华大学举办了“大学·可持续发展”论坛，并发布《清华大学SDG行动报告》，总结梳理学校在落实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采取的行动和努力，全方位展示清华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实践和成果。浙江大学向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发起关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联合倡议与行动计划，将学校自身发展融入全球议程，打造浙大SDGs品牌。

（二）国际化战略对全球性挑战与问题的关注

国际组织对人才的要求是具备学术专长和全球视野，拥有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往往在国际组织更具胜任力。大学国际化战略推动培养具备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化人才，鼓励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为人才进入国际组织提供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

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发展现阶段更关注全球性问题，并提出校园行动倡议。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化战略指出，研究应关注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能源、水、粮食、交通、安全、健康、环境、经济发展等，发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问题，与目标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加强全球合作。对于气候变化与碳中和，乌得勒支大学提出2030年校园碳中和计划，2015年已有58%的教职工骑自行车上下班，当年碳排放量减少6.8万吨。伦敦大学学院关注碳足迹，期待通过全球学术合作与交流增进伙伴关系，通过全球繁荣的研究成果，推动解决不平等问题。哥本哈根大学提出《2030可持续发展制度》，关注气候、资源、卫生、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培养学生和教职工垃圾分类的习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提出在2030年垃圾循环利用率达到60%。

国内大学中，清华大学的战略与行动表现出对全球性问题的积极关注，通过多维度接触全球性复杂问题助力青年学生和组织在世界舞台发声。聚焦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清华大学发起成立的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先后组织“气候变化协同”全球行动等多项全球性倡议活动，通过动员青年行动，提升全球公众对气候变化、碳中和目标的认知与关注，寻求跨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学校还承办了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实践中赋能青年，提升其领导力。在2021年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清华大学专门在学校主页上开设互动链接，体现学校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此外，清华大学与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在人工智能、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清洁交通能源、智能物联网等领域寻求突破，通过学术研究实质性提升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硬实力。

三、促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深入剖析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影响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四个核心要素，聚焦国际化战略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响应及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结合当前世界发展形势与大学发展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一）接轨国际组织发展议程

国际化战略及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应与国际组织发展议程相接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专业知识技能、外语等能力有较高要求，与个人生涯路径也有密切关联。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及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青年接触国际组织、认识世界所关注的全人类发展议题提供了指引，了解国际组织发展议程对青年了解国际组织工作、树立到国际组织工作的长远目标有积极作用。大学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需要更多地将国际组织发展议程纳入其中，以宏观战略引导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二）聚焦全球议题开展行动

全方位、多领域聚焦全球性议题与问题，参与制定行动方案与全球性倡议。国际化战略不只是大学发展的愿景与口号，更需要落实在行动中。应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等全球议题，让青年通过联合国、大学联盟等多边组织平台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规则与行动方案制定，参与跨学科、跨文化的前沿科研项目，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培养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的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已经成为大学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解决世界难题、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的重要考虑。

（三）拓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与国际联合培养

持续探索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与国际联合培养模式下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学科与人才培养优势，引入优势团队和教学资源，汇聚一流科研资源，通过双语教学、参与全球性问题研讨，培养具有卓越学识、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能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高水平人才。

转载：《神州学人》2023年第7期

作者：蒋文嘉 南京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杨晨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王燕苹

郑淳：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价值遵循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单领域到多维度的发展历程。为中外专家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规模不断增大、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的落地生根与逐渐深入等，不仅为中国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过程性与条件性保障，更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征程提供了关键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扎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实现“大同”价值的坚定信念。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既不是“美国化”“欧洲化”，更不是关上大门的“自说自话”，而应该重点强调以下价值关切。首先，我们不采纳英国、澳大利亚等以市场机制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国际教育发展模式，也不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有针对性地设计国际交流计划以获取额外的政治利益资本。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强调以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为基本出发点，以切实服务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既强调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也聚焦服务国家发展利益。其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强调以切实推动中华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核心抓手，以中国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高水平交流合作实现高度耦合为落脚点，以包容、共享、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开展交流合作实践，分享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理论依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早已从高等教育政策话语的“边缘”走到“核心”。从发展的利益偏好来看，也已从前期的政治利益偏好转向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复合偏好，实践形式也从前期的以课程国际化、学术人员互访的单线程机制发展到如今的以项目制、平台化为基本特征的体系化发展模式。事实上，正如德维特、奈特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样式的多样性与方法路径的多元化以及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质认识的多样化，所以涉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术语层出不穷，较为繁杂，但对于相关核心理论的发展并不充分。德维特等学者也曾经发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误解进行纠偏，甚至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已经结束的观点。

中国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后发者，通过多种途径对欧美国家的国际化经验进行了借鉴。经过近70年的实践探索，从形式、内容和路径上积累了中国独有的经验，但仍然较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依托和理论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理论创新精神和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理论阐释的独有之道，为中国高校创新国际化战略提供了许多启示。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理论创新精

神，为中国进一步摆脱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化理论的路径依赖、创造性地构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树立了典范。中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也将为进一步丰富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和实践体系注入新动能。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性，并继续推动本地特色化发展与面向全球化之间的相适应和平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进一步聚焦人员、教育教学基本要素和科技资源的“多向流动”，构建与中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向内”与“向外”的动态平衡。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校准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目标提供了理论坐标。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实践要求强有力的有形与无形资源支撑，包括良好的经济基础、一流的教育教学条件、人民对开展对外交流实践的认同，以及形成得到世界大多数同行认可的教育理念和发展模式等。其中的“高”体现在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内容、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方式、高产出的交流合作产出成效。

三、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路径设计

（一）坚持构建原则的系统性、全面性与多样性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了国家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化改革，系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视野和决心。以欧洲为例，欧洲各国为推进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从1999年开始实施“博洛尼亚进程”，从政府层面到高校层面实施了一揽子政策计划，不仅确立了国家行动框架，还为各高校预留了充分的政策对接与行动空间。当前，从纵向看，中国从国家层面统筹来华留学和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从横向看仍有提升空间，如中国的签证服务体系、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外国专家在华工作流动等领域依然存在政策衔接脱节的问题。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在教育发展、科技发展、在华生活等方面制定系统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尤其应在政府、高校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各级政府部门层面建立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此外，还应进一步提升来华留学生生源国、来华留学学习计划及出国留学目的的多样性，以不断强化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的能力。最后，中国高校应统筹发展其“在地国际化”和传统国际化交流能力，尽可能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参与国际化事务“门槛”较高的误解，为国际化发展红利触及更多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提供信息与互动渠道。

（二）坚持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人才是中华民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无论是作为一种发展策略，还是一种认识论，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构建应始终聚焦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这一核心议题。当前，全球大学排名体系加速了国际化工具理性思维的形成，国际化发展的要素和水平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基本参照。在此情境下，中国既要为

形塑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影响力赢得话语先机，又要始终坚持国际化服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基本原则不动摇。首先，无论是“在地”的还是传统形式，高等教育国际化都需要有力的资源和政策保障。然而，这种保障绝不是“资源堆积”或“政策重叠”，而是有明显聚焦的结构化逻辑，要在学生高质量国际化培养、高水平外国专家引进、顶尖科研合作项目合作方面形成“纵横交错”的相互支撑效应，促进资源的循环和政策的互补。其次，要在创新出国（境）交流计划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方面，尤其在教学计划、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等方面，进一步体现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科学统筹本体化和国际化发展要素，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三）坚持文化交流的底层逻辑

习近平在给希腊学者的复信中强调“要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作为知识创新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大学一直是各国开展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致力于推动思想的互动和人员的流动，还致力于推动各国各民族人民认识事物的方式和价值观念具有“国际性”，学会如何用“他者”视角理解他国他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事实上，没有文化上的互通与相互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就是“空中楼阁”，不具有根本的可持续性，更无从谈起对人类教育事业乃至人类文明的任何贡献。因此，开展高质量和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实践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底层逻辑。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以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形式、载体和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为抓手，鼓励中国高校梳理现有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基于自身的学科特色，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议题框架，发起一批覆盖更多群体、涵盖更多议题及更具包容性视角的交流计划；尤其应进一步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多边交流机制及在各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拓展与东南亚国家、中东欧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高校的长短期文化交流项目，推动文化交流的机制化发展。

（四）坚持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大学是深入推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节点。大学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具有两方面的正当性：一是知识创新需要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科学家的合作；二是持续推进知识的民主化进程需要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支撑。全球科技发展形势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早已演变为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科研能力建设。首先，应基于现有优势学科和潜力学科发展规划以及国际性的科研合作平台，结合在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等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技术方法，通过引进全球顶尖科学家、学术大师或制定定期学术交流计划，组建

科研团队，拟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其次，进一步加快规划集高新科技产业、科技研发公司、中外世界一流大学为核心的世界级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最后，充分利用国际化资源加强科技转化能力。拓展与全球知名跨国科技公司、制造企业的合作方式，通过设立首席科学家的制度，推动有组织科研生态的形成，从国际要素的层面进一步优化产学研的资源配置。

（五）坚持多元网络的合作方式

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动因最初来自学者之间学术旨趣的趋同，具有个体性、零散性和非组织性的特点，如中世纪时期学者通过学者行会进行跨区域游学、讲学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逐渐上升至机构层面，不断呈现出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基本形成了“国家-高校-个体”的发展格局。在经济全球化的浸染下，高等教育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和载体则越来越体现出一种高度网络化、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合作对象也从最初的大学、企业等传统社会组织扩展到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如国际组织、跨国基金会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联合培养学生、共建语言中心、开展多样化文化交流项目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合作，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向正逐渐从“向外”转向“向内”。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高校既要持续拓展与西方高校的交流合作机制和内容，又要加快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合作布局。面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定制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推动联合培养成效的“可视化”。

此外，中国高校应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伙伴矩阵，强化与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科技组织在高端培训、高水平联合科研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学者深度介入全球科技治理议题，同时鼓励更多的学科加入国际认证行列，为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教育市场竞争赢得话语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有历史意义的镜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中国高等教育构建国际影响力的难得机遇。中国政府和高校应持续调整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为中国高等教育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持续性的动力。

转载：《神州学人》2023年第7期
作者：郑淳 西南交通大学文科学部
责任编辑：王燕苹

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粤港澳大湾区）在广州召开

2023年7月22日，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粤港澳大湾区）在广东广州举行。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主题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组长王建军、副组长陈海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文、副省长王曦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岩主持会议，并在会前与王曦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教育部、兄弟省（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广大教育界、科技界人士对广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千百年来，广东人民在岭南大地上繁衍生息、一路向前，教育始终发挥着启智润心、培根筑魂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教育事业亲切关怀、谆谆教导，在今年4月视察广东期间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赋予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对广东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用好这次咨询会成果，大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东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目标，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着力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内涵发展、平衡公平质量，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打牢基础教育这个基点，抓住高等教育这个龙头，统筹推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不断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均衡有质量的教育，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面向发展一线、聚焦科技前沿，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突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服务产业需要，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擦亮广东特色、用好湾区优势，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文章，携手港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为增强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作出应有贡献。希望教育部和兄弟省（区）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各位与会领导和专家多提宝贵意见，帮助广东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怀进鹏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明确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历史方位，坚定教育自信，抓住重大机遇，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思考和把握“强国建设、教育何为”的重大课题。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东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抓紧抓实抓好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教育部将与广东一道，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教育系统要积极主动作为，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核心课题，根据内外部环境形势变化，把握教育规律，优化教育结构布局，更好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夯实基础教育基点地位，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引领带动富有成效的中等教育创新发展，服务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推动教育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二是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支持粤港澳地区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两个“先行先试”，推动“双一流”建设积极融入和引领地方发展，创新卓越工程师和卓越医师培养模式，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三是部省双方要以落实战略合作协议为抓手，谋划部署一系列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要平台，推动开展教育改革探索创新，发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探索性、示范性作用，以高质量教育强省建设助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4月份以来，教育部先后在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召开五场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本次在广州召开教育强国战略咨询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主题，紧密结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重大部署，邀请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和香港、澳门两地有关部门、一流顶尖高校和地方院校、粤港澳新型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代表，共商教育强国建设大计。钟南山院士、颜宁教授等围绕教育支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有组织科研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作了咨询报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时代教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向2035，教育系统和社会各方对建成教育强国充满信心。通过深入交流研讨，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明确了方向、目标和举措，下一步将坚定教育自信，把握重大机遇，勇担历史使命，加快推动教育体系从分散局部调整走向系统性、综合性集成，推动教育发展从不自觉的跟踪模仿走向主动自觉的自信自立，推动教育活动从有组织的学校教育延伸到更加灵活广阔的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以有力举措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答好“强国建设教育何为”的时代答卷贡献智慧和力量。

转载：微言教育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LM_UYUX29bdrPF7_UeO38A

责任编辑：王燕苹

中工网报道：留学生求职首选回国发展理工类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向好

2023年，正在找工作的留学生发现，他们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公司的工作机会减少，导致大家都开始‘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夏宇杰，在今年2月入职ABB机器人公司，他告诉劳动报记者，在他长达近半年的求职过程中，发现一些挺普通的岗位都有不少人竞争。



一、“海归优先”职位减少

去年秋招，很多找工作的留学生发现，国内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变化。夏宇杰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在英国尝试了一下找工作但发现阻力非常大，然后就开始一门心思想回国就业。然而，得到的一些消息使他有些担忧：同校的师哥师姐去年回国找工作，发现本来本科毕业就可以进入终面的一些岗位，出国读研回来之后连初面都进不去。

据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数量明显增长，2021年和2022年保持平稳。与此同时，回国找工作的应届留学生增多，2020-2022年，应届留学生规模指数分别为1.99、2.00、2.17。与2021年相比，2022年应届留学生规模同比增长8.6%，回国求职留学生数量再创新高。

与此同时，平台数据显示，近几年国内海归优先的职位数持续减少，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同比增幅分别为-25.4%、-23.5%、-0.4%。回国求职海归人数增多、海归优先职位减少，一增一减使得海归在国内的求职压力加大。

夏宇杰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海归的优势在减少，很难仅凭一个留学经历，就换取和国内本科、研究生相比更高的岗位和更多的薪资。他告诉记者，自己先后投递了三四十家，有三分之二没有到笔试面试环节，他发现，留学生和在国内读研、读本科的学生差距并不大，随着出国读研的人数增多，海归的优势越来越小。“而且我的一些本科毕业就找工作的同学，会在本科期间不断实习，最后也进入了不错的单位，留学生已不能单靠学历叩开企业的大门，核心竞争力还是在有针对性的发展自身技能和思维。”

二、信息差成求职“拦路虎”

阻碍留学生找到心仪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拦路虎”，这就是国内和国外的信息差。研究生毕业前的数月，夏宇杰忙得焦头烂额。一面是临近截止日期的毕业论文修改；另一面要准备国内公司的笔试和面试。他告诉记者，留学生很难从国外的就业辅导中获得国内的就业信息，国内企业会有大规模的春招和秋招，但国外没有这样的概念，导致部分留学生错过国内关键的招聘时间节点。所以一切都要自己格外上心，查询各类网站，搜集各种资料。

三、理工科专业仍是“硬通货”

摆在“回流”留学生面前的，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就业市场。在近半年的求职过程里，夏宇杰也时常感到压力。

比如他的本科专业是自动化，研究生专业是机器人，虽然掌握计算机编程技能，但互联网“大厂”招聘基础岗位，清一色偏向软件编程，且要求有一定实习经历，因此他虽然手握不错的简历，但也未受到大厂们的青睐。

无缘大厂让他看到自身的不足。他表示，“我参加过华为、小米的面试，发现哪怕像自动化这种‘万金油’的专业，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热门岗位，往往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本身的优势。而且面试之后发现，国内的企业更看重职位的匹配度。”

不过，求学回来的海归们还发现，随着国内科技产业高速发展，理工科专业仍是“硬通货”。

能够入职ABB，是夏宇杰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在英国留学期间，一次在实验室上课时，看到教授们用的就是ABB的机器人，从此他的心中就埋下了一颗“求职”的种子。

他表示，第一份工作自己比较看重平台，大平台会有更系统的培养机制和上升体系，能让自己对行业有更开阔的理解。“初入职场，一开始薪资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反而更在意工作的成长空间、团队的氛围。能够在自己喜爱的行业里将所学运用到实际项目中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同时我的工作还能反过来拓展我的思维，这是个很棒的良性循环和工作体验。”

四、记者手记：出国前应有明确职业规划

尽管面临激烈的竞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3月在京发布的“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海归的整体就业形势仍较为乐观。77.41%的调查者表示3个月内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这部分海归中80%以上是2个月内即可找到工作。

海归的就业去向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属于商科范围的金融业领先。从事的行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业(22.95%)、制造业(16.39%)、文化体育教育娱乐业(16.39%)，以及电信及电子信息服务业(8.20%)等。超过86%的海归表示，所从事的行业和所学的专业至少有部分相关，只有13.11%的海归认为两者完全无关。

相比较“镀金”经历，海归对于企业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专业、自身技能、实习经历以及思维方式上。另外，如果在出国前已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往往回国后能有较强的优势。

“现在就业市场僧多粥少，我们肯定是在优质的人才里面挑选。”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向记者表示，“我们不会对出国读研和在国内读研的人才开不同的薪资，除非他的经历非常加分，且匹配我们的职位。比如，我们招聘海外事业部的人士，如果能够使用英语、西班牙语等作为工作语言，或者曾经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去跨境业务部门实习，工资会比较高。”

另一家外企HR则透露，自己企业招聘时，更看重学生通过接受国际化教育培养出的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多元角度思考等能力，因为这些能帮助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如今，企业更看重一个人在职场上的学习能力和上升潜力。其中，全球视野就是留学生的一大优势。

转载：中工网

<https://new.qq.com/rain/a/20230626A05JS500>

责任编辑：王燕苹

协同治理：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一、问题提出

进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急需拥有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通过完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本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层次的上升。相应地，职业本科教育机构也需要提升办学绩效以应对复杂的产业需求变化。与此同时，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作为保障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与时俱进的关键武器，也愈发受到各国重视。

新西兰作为职业本科教育发轫较早的国家，在21世纪初便开始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实践。经过近20年的实践探索，新西兰逐步构建出“四位一体”的职业本科质量保障格局。近年来，新西兰致力于实现针对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协同治理，并于2020年实行职业教育改革，有效推进新西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而革新了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运行机制，实现政府机构的“去中心化”，有效平衡了政府外部问责机制与职业本科教育机构内部专业自治权。本研究将协同治理作为研究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理论基础，以2020年新西兰职业教育改革事件作为切入点，分析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协同治理制度的构成要素，探究各主体之间的权力架构、共同目标与功能整合机制，明晰各主体的协同治理实践，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把握其质量保障协同治理的整体样态。

二、框架结构：协同治理与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契合性

协同治理是衡量组织系统内部运行效率的标准，它与职业本科质量保障体系有着显著的内在耦合关系，透视其内涵与特征有助于理解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一）契合性分析

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使各利益相关者共同与公共机构参与讨论，进而形成共识型决策，其关注重点在于公共政策与公共问题。

首先，协同治理强调系统内部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在治理理论中，政府并非唯一的权威主体，整个系统还由非官方机构、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主体构成，在这种权力制衡格局下，有效克服了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弊端。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加什在《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将协同治理界定为“为了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或管理公共项目与财产，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连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制定正式的、目标一致的、审慎的共同决策过程”。

其次，该理论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面对变化中的外界环境，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需要相互协调、资源整合，促使系统内部乃至整个系统高效运转。朱纪华提出，协同治理是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公共生活过程。在共同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通过优势互补形成和谐、系统、高效的公共治理网络。

再者，协同治理内部存在自组织的明显特征。从系统科学角度来看，协同治理具有典型的自组织特征。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将自组织定义为“复杂系统的一种能力，它使得系统可以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其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在共同利益与目标的驱使下，各子系统利用自身优势，相互间竞争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动与平衡。

基于对协同治理基本内涵的分析，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作为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后出现的产物，与协同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第一，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一个平等且包容的系统。在质量保障实施过程中，需要多主体对职业本科教育质量的优劣提出标准与要求。第二，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内部各主体构成协作关系。随着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提升，需要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治理过程中，以弥补政府主导下存在的治理短板。在博弈与协商之后，各子系统将打破单一化的权威权力，实现“去中心化”，形成治理权威的多元化，促使协同治理迈向更高层面。第三，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存在共同规则的制定以促进自组织的实现。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的建立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必然制度创造，而政府作为规则的最终决定者，颁布相关法律政策作为强制性规范，保障了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内部运作的有序性。共同规则的制定是各行为主体开展活动的前提，此类规则是在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产生的，决定着治理成果的优劣。

■（二）研究分析框架

正因为协同治理与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存在有机的联结性，故本研究选用柯克·爱默生在《协同治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中的设计框架，对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进行研究，并主要讨论协同动力与协同行动两个维度(图1)：①协同动力：作为协同制度的一部分，协同动力呈现了制度构建的整体形态，具体包括三个交互的组成部分，即有原则的参与、共同的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②协同行动：协同动力的三个组成部分以互动和反复的方式工作，产生协同行动，而协同行动将联结协同动力的内外要素，产生协同治理的影响与适应效果。协同动力与协同行动作为该理念框架的核心特征，共同构成协同治理制度，两者共同塑造协同治理制度的发展方向与有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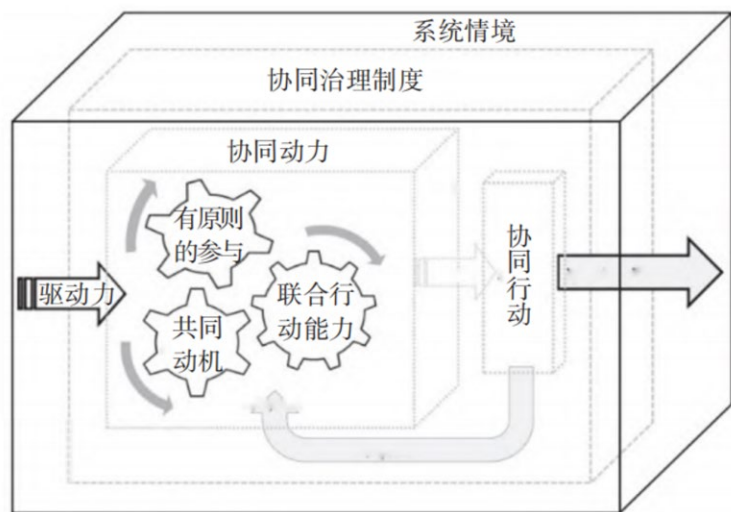


图1 协同治理综合分析框架的三维结构

三、协同动力：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实现基础

在协同治理综合分析框架中，协同动力分别代表协同治理制度下不同机制的分工协作。三部分分别对应着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组织架构、动力机制与功能整合机制，它们作为协同治理制度构成的实现基础，保障了体系结构运行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一）有原则的参与：多元协同治理职业本科教育质量的组织架构

有原则的参与这一互动关系是持续发生的，重点在于参与过程的“原则性”。作为协同治理的基本原则，不同主体通过探寻共同价值与利益，进而阐明共同目标以达成共识。

在构成主体上，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了以政府机构(包括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与高等教育委员会)、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行业企业以及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为核心的“四位一体”质量保障架构。其一，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与高等教育委员会是负责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政府机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作为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统筹机构，其成员构成以行业人员为主，且受政府管辖，是保障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本科质量保障的核心主体。而高等教育委员会在经历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后，在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中的角色转变为督察者身份，间接参与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其二，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虽由新西兰政府委托设立，但它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作为新西兰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执行机构，在职业本科教育乃至整个新西兰教育质量监管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行业企业在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依据《教育与培训法》的条例规定，它们已通过多途径渗透到与质量保障相关的各个机构，并参与质量保障过程。其四，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由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NZIST)举办，由16所新西兰理工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各学院保留原有名称与机构建制，都具备颁发新西兰资格框架中7级学士学位等级的资质，肩负培养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是新西兰举办职业本科教育的唯一主体。

■（二）共同动机：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

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产生巨大向心力，其原因在于对两大主题的切实关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在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旨在培养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并需要办好贯彻“适应生活的学习”理念的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在该共同动机的驱使下，多元主体基于“策略性算计”采取相应行动，以最大限度满足自身偏好，使它们分别跨越原本各自为政的组织、部门与管辖范围，朝着共同方向前进。

1. 满足社会转型对人才的诉求，培养复合型高技术技能人才

新西兰资格框架的价值内涵，汇聚并凝练了多元主体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成为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下各子系统协同治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资格框架中7级(对应的是本科/学士学位层次)所描述的知识、技能与应用能力的标准，反映了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三维目标：在知识领域，个体需要掌握一个或多个学习、工作领域内的高级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在技能层面，需要具备分析判断复杂情境问题或不可预知情境问题的能力；在应用能力方面，需要能通过已掌握的高阶知识和技能开发出高水准的问题解决方案。此外，作为具有学士学位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新西兰资格框架还额外要求职业本科教育需要保证学习者具有卓越的个人学习素养——不仅需要拥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批判思维与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具有知识获取、理解与信息评判的能力，同时团队协作能力与沟通交涉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素养之一。为满足知识、技能、应用能力与个人素养在人才培养中的要求与水准，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承载着为职业本科人才提供系统和连贯的专业理论知识传输，为学生的自我指导与发展传授基本的技术，关注人才培养中知识结构复合化、能力构成多元化和实践经验丰富化等重要使命。作为新西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角色，职业本科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需要着眼于产业未来发展，致力于通过技术改善生活，并要求具备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2. 建成“适应生活的学习”的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

2020年的新西兰职业教育改革秉承的核心理念为：打造“适应生活的学习”的职业教育体系，扭转原有学习模式与样态(即学习者的学习形式与方式受限于既定的职业教育体制框架，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职业教育机构要求，调整自身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以此构建更具人性化的学习范式，为学习者当下生活提供最大便利。从“适应学习的生活”转向“适应生活的学习”，职业教育改革理念的转向首先改变了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整体形态，原有的16所新西兰理工学院整合为覆盖全国的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综合在职学习、在校学习与在线学习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改革给新西兰的职业本科教育机构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反映出多元利益主体对于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期许与高要求。因而，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的内部质量保障需

要更加关注以下问题：第一，提供适应学习者未来生活的学习，整合职业本科教育资源，避免各院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需要更加注重考量学习者未来的发展状况，保证他们当前所学能够适应未来行业企业的发展需求。第二，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需要提供适应所有学习者生活的学习，关注每个少数族群或弱势群体，重视各类群体的权益，以实现职业教育内部各群体的平等互通，消除不同文化、不同境遇之间关系不对等状态。

■（三）联合行动能力：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协同治理的功能整合机制

协同治理制度是在平等沟通与协商基础上建立的，其目的在于确保协同治理有效配合并产生有益影响，汇聚各方资源与信息以实现自我更新与自我强化。在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协同治理的共同动机驱使下，如何全面监测与管控人才培养与办学质量，成为一大关键问题。

基于评估的质量保障框架(EQAF)，新西兰资格认证局针对除大学以外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设计了质量保障框架。该框架注重结果与过程两种维度，旨在通过一定的评估手段充分了解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教育绩效与教学水平。该框架有效保障了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多元利益主体均能有效参与到质量保障监控的过程中(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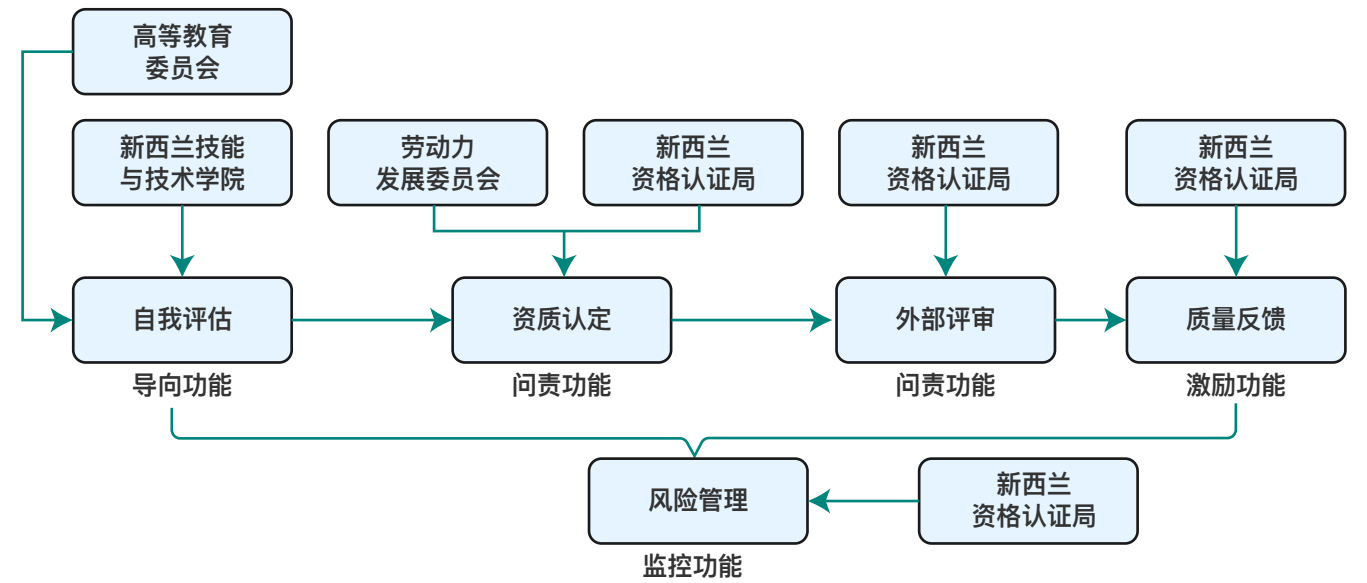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评估的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框架运作机制

首先，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会率先进行自我评估，而高等教育委员会作为参与提升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能力的监察者，同样也会参与学校的内部评价活动。需强调的是，自我评估与外部评审采用相同手段与工具，这种内外评估标准的统一保证了质量保障框架价值理念的有效传递，也简化了外部评审的工作流程。其次，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联合劳动力发展委员会进行基于新西兰资格框架的资质批准与审核，依据新西兰资格框架的具体要求对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学位等级资质进行评估，注重通过评估手段审核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问责

机制的控制能力，有助于生成基于信任的质量保障文化。再次，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进行外部评审，该评审机制依据相应的测量工具进行考核，简化了繁琐且无章法的考核内容，最终形成质量年报反馈给学院并进行社会公开。该做法不仅发挥了社会问责功能，也通过评估反馈对各学院形成激励作用。最后，采取相应措施实现风险治理。新西兰资格认证局在进行外部评审时，有权对任何违背质量标准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采取制止措施。新西兰资格认证局监督的质量保障框架在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内生动力与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评估监管的外力作用下，共同促成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良好运作，对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实施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办学细节规范与管制的作用。

三、协同行动：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动态呈现

协同行动作为协同治理框架的核心，是围绕协同治理目标而展开的具体行动，是对协同治理制度要求的积极回应。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内各主体在明确的目标与功能整合机制下，展开一致的协同行动，保证质量治理过程的程序有效性(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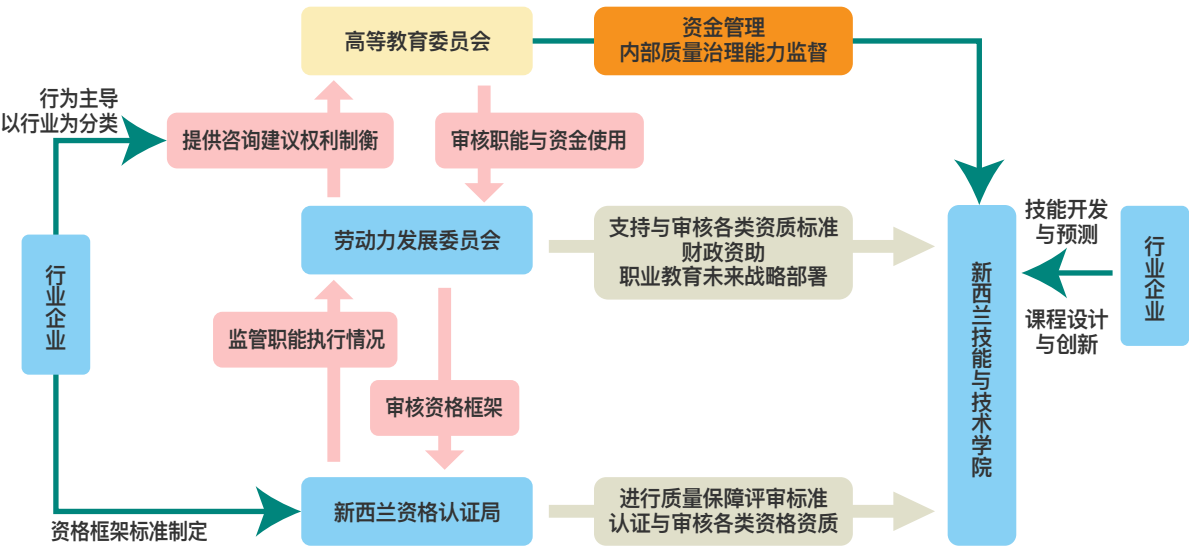


图3 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协同行动

■ （一）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制定整体质量标准与质量发展战略部署

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作为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新晋领导组织机构，主要涉及职业本科质量标准制定、职业本科教育战略部署计划审议与有关资金计划许可等。该组织通过大胆探索职业本科教育的新途径、新模式，将质量保障落实到办学的具体环节中。

在宏观质量标准的制定上，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将为职业本科教育的教学与培训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包括新西兰资格框架、各种微凭证、课程教学培训大纲等)，并对各类教学与培训计划予以支持、审核与评估，将各行各业的最新人才培养标准反映到课程教育与培训中，并推广应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各类学习模式中。劳动力发展委员会是各类课程与培训计划投入运行时的第一道关卡，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各类课程需要先获得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批准认可，才能获取新西兰资格认证局的相应资质。若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对课程、教学与培训计划存在质疑，有权提供建议并要求学校对计划方案进行修改。

在职业本科教育战略部署计划审议与有关资金计划许可上，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与联合高等教育委员会进行多边洽谈与协商。在此阶段，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制定高等教育战略发展计划时，会切实将职业本科教育的实际情况纳入考虑范围，以此为职业本科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若劳动力发展委员会认为高等教育委员会未充分回应或满足其提出的合理性建议，则劳动力发展委员会有权驳斥该计划。

■ (二) 高等教育委员会：指导院校质量自治与完善经费支持

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强化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自我监督与管控系列资金分配与流向，引导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方向，其主要行使的是质量保障决策职能，发挥“导航器”“控制仪”“守护神”的作用，重点解决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自身无法解决而又严重制约学院运行的外部环境问题。

在绩效管理方面，高等教育委员会作为“看得见的手”，对职业本科教育运行进行宏观调节与控制。高等教育委员会为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提供咨询建议，帮助学院探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新途径，从而提高院校的自我决策能力与自我监督效率，构建教授治校、自我管理的教育管理机制。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理事会将督促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定期自我审查、自我监督，以生成学院内部质量治理文化，维护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专业自治的主动权，促使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及有效利用。

在资金管理方面，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严密的资金筹集、资金分配和财政审核机制把控职业本科教育的资金管理，保障资金投入能有效促使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系列目标的实现，推动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事业的有效运转。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需要每年提供两次具体的财务信息及未来财政预测，公示其资金开销的具体细节。通过建立完善的教育经费分配机制，规范职业本科教育的各项质量活动，保证教学行动的有序开展。

■（三）新西兰资格认证局：围绕人才培养质量与学院办学质量展开监督

新西兰资格认证局作为职业本科教育质量考核的执行机构，在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通过采取质量监督的协同行动，将社会经济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最新要求及时纳入新西兰资格框架标准以及系列培训与课程教学等材料中，并对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办学质量等信息进行评估反馈，使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朝着社会所需的方向发展。因此，新西兰资格认证局需要定期审查新西兰资格框架，并在必要情况下对相关的定义与标准内涵进行更改，确保形成适宜且明确的系列标准。

由于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负责具体的质量保障流程安排，因此它在质量保障框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该组织主要围绕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自我评估能力审核与教育绩效水平两方面开展评估工作，采取书面材料审查、现场调研、场外调研(作为现场调研的后续补充，采用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等审核形式，力求得到全面中肯的评估结果。在审核结束后，新西兰资格认证局会指出院校在运作上的优势与不足，明确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形成整体性质量报告，并作出相应的等级评定，最终根据不同的优劣等级采取激励或制裁措施。由此可见，新西兰资格认证局为职业本科的质量保障起到了规范与审核的作用。

■（四）行业企业：依托官方机构保证参与质量开发与监管

行业企业作为职业本科教育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主要依托官方机构保证自身参与质量开发与监管的职责，是职业本科质量保障的维护者、执行者。在宏观层面上，行业企业在职业本科质量监督与评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成员是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的有机构成，会参与新西兰资格框架标准与职业本科课程与教学方案制定等。在微观层面上，行业企业在职业本科课程设计与开发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新西兰职业教育的重大举措中决定成立两个特殊机构：区域技能领导团队与职业卓越中心作为保障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与教学设计开发的重要桥梁。这两个机构依靠行业企业的直接介入，保证技能发展预测的科学性以及人才培养内容的创新性。整体上看，行业企业不仅通过参与区域技能领导团队为区域技能开发与预测提供支持，提高学习者技能与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适配性，而且通过与职业卓越中心的合作，共同聚焦课程开发和培训流程设计，负责课程创新与研究等具体实践，提升职业教育创新能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五）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内部质量文化的构筑与灵活的教学实施策略

在质量保障过程中，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面临着一对主要矛盾，即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群体对于职业本科教育过程的满意度与社会对于高级技能技术人才培养结果的接纳度。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需要去平衡这对矛盾，为此它们通过构筑深厚的内部质量保障自治文化，注重学生培养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在专业自治的界限内构建来自外界的问责机制，以适当内化外部质量保障机制所展现出的价值取向。

1.通过内部自主评估，实现自我完善

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认为：“一个国家的高校系统可以主要由学术权威来协调，而不是通过国家官僚的命令或市场来施加作用。”仅依靠新西兰资格认证局通过外部评审的外力作用来监督与管控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教育教学质量，将不足以支撑新西兰职业本科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转，亦无法促使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卓越典范。只有依靠自我评估形成的内部评价文化，构建基于数据驱动支持下的自我反思与改进系统，才能提高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绩效，方能突出其质量保障的关键作用。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的董事会会统一负责自我评估事项，他们主要对学院运作过程中各种系统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通过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反思性经验，发现实践中潜在的质量风险并加以监管、消除。这种自治与问责体制以内部质量保证为目的，与新西兰质量保障框架标准严格对接，并由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自主实施。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需要借助自我评估指标要求，充分发挥评估的灵活性与自主性，实现自我评估能力提升，通过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以提升课程与教学、应用型研究、组织管理等各类项目的质量。

2.借助灵活的教学实施策略，优化学生教育体验

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作为覆盖全国的网络式教育机构体系，其灵活的教学实施是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核心。职业本科教育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开放的入学要求、多样学习形式选择、宽松的学习时限等方面。首先，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对学生年龄不设限制，学生只要满足学位等级资格所要求的入学标准，便都有资格进行申请。其次，学生有多元化的学习形式选择，不管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学习、选择学校本位或工作本位抑或是在线学习方式，学生都有权利根据自身需要在多种学习形式中灵活切换。此外，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子学院中穿插学习，他们能够充分享受不同学院的优质教学资源。再次，职业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采用宽松的学习时限以吸纳更多有职业提升需要的社会人士。课程的学习期限通常为4~6年，部分专业也允许10年之内完成学业，学生只需修满要求学分即可毕业并获取学位。该举措不仅通过高灵活性吸引了更多生源，更催化出“围绕学生，注重个性化”的教学特色。

五、结语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作为全球教育普遍关注的议题，其治理过程具有动态复杂性，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正因如此，新西兰通过加强协同治理能力、优化治理行动与成效，以应对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复杂过程。基于协同治理综合分析框架，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的协同治理制度得以整体而全面地呈现。首先，形成政府机构、质量保障机构、行业企业、院校“四位一体”的多元治理格局，是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内部协同治理的重要前提；其次，围绕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与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绩效能力的共同目标，是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

性，产生协同作用的关键要素；再次，质量保障框架作为联合各主体协同行动的功能整合机制、充分激发各主体参与质量保障过程中来的重要机制，是协同治理开展的关键基础。在完善的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框架下，各主体的协同行动得以有序规范开展。在面对人才需求变化迅速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新西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作为提升高技术技能人才质量，把控新西兰技能与技术学院办学质量的关键一环，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功效。

转载：《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15期

作者：余雅兰 华东师范大学
马君 陕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王燕苹

「国内外视野」

英国将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上升为国家战略

回溯英国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英国在教育改革与战略布局中始终围绕着一主线，即培养服务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人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综合国力削弱，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政策已经后继乏力，亟须进行教育改革，以为国家再度强盛积蓄大量高素质人才资源。

一、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多领域人才辈出

英国现代高等教育改革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一是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广泛培养优秀人才。二战后到本世纪初，英国相继出台了《罗宾斯报告》、《迪尔英报告》等改革文件。《罗宾斯报告》提出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所有具备学习能力和资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应该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罗宾斯原则的提出彰显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追求，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

二是引入“教学卓越框架”，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教学质量信息。英国在2011年提出“研究卓越评估框架”，旨在评估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质量和影响力。在历次评价中，牛津、剑桥等传统研究型大学排名靠前。但评价受到各方批评，认为高校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因此，英国于2017年引入“教学卓越框架”，旨在评估和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以上转变意味着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注重在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果，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提供优质教学。三是强调实践导向的教育。英国高等教育通过与行业合作，引入实践导向的教学和职业培训，培养了大量具备实际应用能力的毕业生。

在这一改革下，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在英国涌现，众多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文化领袖也汇聚于此。

二、现代学徒制着力高层次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

在英国，学徒制是一项古老而重要的传统，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学徒制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在专业工作环境中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习得实践技能和行业知识。在工业革命冲击下，大规模机器生产取代了个体手工作坊式生产，传统学徒制逐渐被学校职业教育所替代。然而，单一的学校职业教育过于重视理论教学，无法与工作岗位实践很好地融合，难以满足社会生产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区别于传统学徒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旨在实现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和管理，以高效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的，融合了师徒传授与正规职业教育的形式。英国于1964年出台的《产业培训法》，首先推动了学徒制度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建立了行业培训委员会，制定了培训标准和规范。学徒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匠和技工行业，而是逐渐扩展到金融、信息技术、健康护理等更多领域。1993年，英国政府宣布推行新的改革计划，设立专门机构、扩大培训规模、健全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现代学徒制发展。此外，高等学徒制的出现则是这一进程中的最大亮点。为提升学徒制的地位和质量，英国推动了学徒制与高等教育的融合。2010—2013年，高等学徒制人才培养项目在学习内容方面取得和传统高等教育同等地位。可以说，现代学徒制助力英国职业教育由落后面貌转变为国际社会推崇的模式，极大推动了英国经济发展。

三、STEM教育战略缓解相关领域人才短缺

21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战略层面出台促进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2004年，英国颁布《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04—2014)》，首次在政府文件中引入首字母缩略词“STEM”，确定了超过470个STEM计划。另外，英国2006年的“STEM凝聚力计划”、2014年的《科学与数学教育愿景》报告、2017年的《工业发展战略绿皮书》等国家战略性文件，也都赋予了STEM教育一定地位。

作为具有传统科学优势的英国地区，苏格兰政府认为，STEM作为科技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应纳入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划。苏格兰政府实施的2017年至2022年为期五年的STEM发展计划，旨在全面提升中小学STEM教育质量。实践表明，国家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出台政策、搭建平台和开展项目，有助于缓解STEM人才短缺问题。2010年以来，在系列STEM教育计划促进下，高等教育STEM学科的研究生就读人数从2002年到2010年增加了37%。另据202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显示，STEM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开展提高了苏格兰学生在数学等学科中的表现，这对于扩充未来STEM领域的青年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四、国际人才竞争战略支撑高科技领域位居世界前列

21世纪以来，英国注重吸引汇聚国际人才。英国以占世界1%的人口进行着世界上5%的科研，大约一半的博士生和约40%的研究人员为非英国公民。一是善于通过大学和研究机构来争夺国际高端人才。如英国政府与基金会等合作，曾每年投入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帮助研究单位高薪聘请50名世界顶尖级研究人员。很多有声望的英国大学经常雇用有能力的外国人才作为高层领导。二是不断升级移民政策吸引高技能人才。2002年，英国政府出台首个高技术移民签证政策，专门用于吸引高层次海外人才。2008年，英国正式实施“计点积分制”移民政策，这意味着只有高技能人才才容易获得长期签证。三是学生移民与留学政策也是重要的国际人才竞争手段。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际留学目的国。1999年，英国就提出了“要在5年内争取到全世界1/4的留学生”的目标，通过奖学金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

为应对脱欧带来的诸多挑战，英国政府于2019年发布了新的国际教育战略，提出到2030年两大发展战略目标，包括留英国际学生增加到每年至少60万人、每年的教育出口额增加到350亿英镑。为实现该目标，英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更加注重与新兴经济体建立教育合作战略关系，确保其高等教育对国际学生的高吸引力等。

五、数字人才培养在国家数字战略中发挥重要支柱作用

2022年10月，英国政府发布新版《数字战略》，旨在使英国成为全球开展数字创新的最佳地点，巩固英国作为全球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该战略明确了六大支柱，分别为构建世界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激发创意和保护知识产权、吸引全球的数字经济人才、为数字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数字化提升整个英国的商业与社会服务能力、提高英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地位。在数字技能和人才方面，该战略提出加强学校数字教育、提高青年对数字职业路径的认识、培养高级数字技能、培养公民终身数字技能、与私营和第三部门合作提升数字技能、吸引全球最优秀的数字人才等多方面举措。

英国政府资助大学开设新的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转换课程，为人们提供发展新的数字技能或接受重新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英国的尖端人工智能（AI）和数据科学领域找到新的工作，即便他们此前没有这个领域的相关经验。

六、天才儿童教育推动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

20世纪90年代末《城市卓越计划》的发布，意味着英国开始建立现代天才儿童教育体系。该项目从每所学校选拔5%—10%的天才儿童，为学校课余时间的俱乐部、校外活动等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一些地区设立80个优秀人才中心，负责为天才学生提供帮助。进入21世纪，英国天才儿童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2003年在华威大学设立了国家英才青少年学院，为全国排名前5%的11—18岁天才学生提供支持，包括向教师提供专业的天才儿童发展资料、资助学校天才儿童研究项目等。另外，政府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技术指南，如教育部提供的用于识别天才儿童的技术指南等。

总的来看，英国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天才儿童教育管理体系。国家层面主要提供技术服务和质量标准，地方层面负责教师培训和合作事宜，而学校层面负责具体管理和实施。从筛选来看，英国的天才儿童并不限于学业能力，而且选拔也不限于单次的评估，而是强调动态的过程。筛选天才儿童的方法主要包括提名法、行为核对表法以及以考试成绩作为参考指标等。从早期培养来看，英国通过个性化教学满足天才儿童特殊的教育需求，如将特殊课程融入学校日常课，或加速教学内容，进行分层分班教学等。

转载：《中国教育报》第9期
作者：唐建朝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燕苹

「中心动态」

关于邀请参加第24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平行论坛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研讨会的通知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教育年度盛会，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也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教育盛会之一，每年吸引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余名全球教育界精英和社会各界代表参会。

作为本届年会的平行论坛之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联合承办，将邀请国内外高水平院校和教育研究机构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国别与区域实践研究等热点议题开展研讨，分享国际教育行业同仁们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经验，探讨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新举措和新机制。研讨会中将分享来自中国香港、美国、英国等高校的案例，以期抛砖引玉、激发同仁们的思考。

论坛拟定于10月27日上午进行，具体举办时间和地点待定，详情请关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年会官网www.cacie.cn

附：论坛议程

09:00–09:05 开场

主持人：交流协会学术交流与研究部代表

09:05–09:20 嘉宾致辞

1.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代表
2.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杨中民

09:20–10:30 主旨发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

1.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 任增林
2. 广东省教育厅交流合作处处长 李金俊
3. 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 莫家豪
4.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 Gary Miron
5. 英国NARIC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项目总监、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网络(INQAAHE) 董事会成员、英国认证委员会(BAC)认证委员 Fabrizio Trifiro (视频)

10:30–10:50 茶歇

10:50–11:50 主旨发言(2022年度中外合作办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成果分享)

主持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副主任 庄慧娟

1. 中英合作办学发展状况研究

沈阳大学校长 赵彦志

2. 中澳合作办学发展状况研究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副院长 胡笑寒

3. 中爱合作办学发展状况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一都柏林国际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吴文英

4. 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主任 吴剑丽

11:50–12:00 交流互动环节



欢迎订阅我们
扫码可获得PDF文档



华南师范大学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联系我们

☎ 0757-86687180

☎ 528200

✉ xlhuang@ibc.scnu.edu.cn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桃园西路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